

文昌信仰与孝道文化的完善

夏红梅, 朱亚辉

(中国医科大学 社科部, 辽宁 沈阳 110001; 厦门大学 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宋元时期, 儒家孝道文化越来越显露出自身的矛盾和难题, 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文化的灌输和改造。道教孝道文化尤其是文昌帝君的出现, 在吸收儒家孝道思想基因和解决儒家孝道难题的基础上, 从宗教神学的立场出发, 解决了忠与孝的两难、如何辩孝以及行孝的言行一致等一系列问题, 从宗教心理和行为上建立了神佑鬼惩的监督手段等, 表现出独特的宗教特色以及中国本土的文化特性, 为中国孝道文化的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文昌信仰; 孝道文化; 意义

中图分类号: B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4970(2005)01 - 0095 - 03

注重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 孝道文化在中国古代思想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学术界一般把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归为儒家学说, 对其他学派的孝道思想研究则太少, 尤其是对道家 and 道教的孝道文化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近几年来, 已有学者开始着手道教孝道文化方面的工作, 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 李刚先生的《道教生命伦理学的孝道》、李远国先生的《论道教的孝道思想》、肖群忠先生的《〈文昌孝经〉的道教孝道观》等。这些成果都对道教中的孝道思想研究作了重要阐述。笔者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 拟选取文昌帝君为例, 就道教在中国孝道文化完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特殊意义进行专题论述, 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指正。

一、儒家孝道文化的困境和矛盾

中国孝道文化源远流长, 早在三皇五帝就提倡孝行, 学术界一般认为孝道文化的理论化、定型化最迟在周代已经形成。经过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改造和更新, 特别是儒家学派的孔子、曾子、孟子和荀子等的努力, 完成了儒家特色的孝道文化理论的结晶《孝经》。由于只有儒家才有孝道著作的诞生, 所以一般认为孝道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 并且《孝经》被后世列为“五经”之一。

这只是关于孝道文化产生的情况, 那么中国孝道文化的完善是不是由儒家文化来完成的呢? 我们认为, 儒家孝道文化未能完成中国孝道文化的最后完善。原因有:

第一, 从儒家孝道文化自身来讲, 儒家思想学说的特色是它的伦理色彩, 不带有强制性, 只是给人一种向善的可能性和指导性, 它相信人的本性是可以存善去恶的, 这是一种克己功夫。从理论上儒家认为, 可以造就出许多为人师表的道学家, 来为众多民众提供规范和榜样, 但是事实上并不能行通, 反而会造成许多伪善的行为。

比如, 伪装孝道, 从中牟利。像汉代, 孝道行为往往与

仕途连在一起, 举孝廉是走上仕途的第一步, 为了当官, 许多人弄虚作假, 欺蒙世人。《后汉书·陈蕃传》中就记载过这样的事例: “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阼隧, 因居其中, 行服二十余年, 乡邑称孝, 州郡数礼请之。群内以荐(陈)蕃, 蕃与相见, 问及妻子, 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 ‘圣人制礼, 贤者俯就, 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数, 以其黜故也。况及寝宿冢藏, 而孕育其中, 诳时惑众, 诬污鬼神乎?’遂致其罪。”从上述所引材料中, 我们得知赵宣为了做官, 不惜以服孝为幌子, 骗得了世人的称誉, 但最终还是被揭穿。赵宣的行为并不是个别现象, “举孝廉, 父别居”, 正是这种伪装孝道的绝好讽刺。

比如, 盲目顺从, 愚孝事亲。在汉代孝道曾发展到痴愚的地步, 父母生病, 子女割股、挖乳、剖腹。《二十四孝》中这类事例比比皆是。鲁迅先生对此非常反感, 曾对这种孝道文化予以猛烈的批判。^{[1](P121-123)}

儒家学说中的孝道文化理论和实践, 并不能很好地结合, 也缺乏有效的措施和机制保证孝道文化在行为上的实践。

第二, 从儒家孝道文化的外在机制来讲, 早期统治者之所以重视孝道文化, 在于它是脱胎于西周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 可以说孝道文化正是从宗法制社会延续而来的。何谓“孝”? 《说文》云: “孝, 善事父母者。从老省, 从子, 子承老也。”金文“孝”字从字形上看, 上部像戴发伛偻老人, 象形; 下部“子”搀扶之, 会意。《尔雅·释训》云: “善父母为孝。”因此, “孝”之本意乃善事、顺从父母。儒家向来重视“孝”这一人伦观念, 称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为孝悌, 并视之为仁义之本和儒家三纲五常伦理之基。《论语·学而》云: “君子务本, 本立即道生。孝悌也者, 其为仁之本欤!”儒家还有专门论述其孝道和孝治的经典《孝经》。

按肖群忠先生的说法^{[1](P14-19)}, 孝的最初含义之一就是“尊祖敬宗”, 孝子就是宗族中的宗子, 即嫡长子。同时按照

收稿日期: 2004 - 09 - 20

作者简介: 夏红梅, (1977 -), 女, 重庆人, 中国医科大学社科部教师; 朱亚辉(1978 -), 男, 河南汝州人, 厦门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国君继承制度，他又是储君，是未来国家的君王。在西周文化里，孝道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巧妙结合起来。西周社会重视孝道文化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宗法制度，以保证宗族内部等级的维持。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这种宗法制显然不合时宜，大的宗法制（即与国家制度相结合）被动摇，被摧毁，只留有小的宗法制度（即家庭内部的孝道文化），那么孝道就变形为只对家族、父母的义务。

原有的家国同治的模式被打破，这是统治者所不允许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独特的怀旧情绪，他们希望重新回到西周的统治模式中去，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经过先秦儒家的努力，《孝经》的出现更可以说明确原有统治秩序被打破的情况。

晋文先生在《论经学与汉代忠孝观的整合》^[2]一文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汉代经学家为了强调忠君爱国，提出了“家国同构”的理论，由孝劝忠，但是把忠君作为孝亲的目的。这是很有见地的。在汉代以后，“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就被贯穿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魏晋南北朝、唐、五代时期，尽管门阀政治严重，忠君思想淡薄，但是孝道文化却愈演愈烈，有孝子无忠臣。孝和忠不再同时兼顾，大多数人在家是孝子，在国却未必是忠臣，这是令统治者头痛的事情。因而孝道文化在唐以前不太受重视。

唐宋以后，孝道文化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完善和加强，其中原因固然有统治者专制思想的加强，中央集权制的建立。但是这种回答似乎不能令人满意，文化的内涵和思想积淀，并不是只靠一个政治经济的原因就可以完成的。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3]^(P355)在儒家孝道文化发展的同时，道教孝道文化也蓬勃发展起来，为儒家孝道文化对面临的困境和难题的超越和解决，提供了契机，对中国孝道文化的完善起了重要作用。

二、孝道文化的道教化解答

与儒家“孝道”思想相呼应，早期道教经典也有不少重孝的思想论述。宋元时期道教还产生了一个以忠孝为本的道派——净明忠孝道，兹不详述。^[4]下面我们仅就文昌帝君与孝道文化的完善展开讨论。

文昌帝君是道教诸神之一，关于它的来历以及和道教的结合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文昌原身是天上的文曲星，主管人间的功名和禄位，帝君指的是梓潼帝君，据说帝君叫张亚子，因报母仇而迁居七曲山，后来仕晋战死，因他世代显灵，所以受到唐宋统治者的封赏，唐玄宗封之为左丞相，唐僖宗封之为济顺王，宋真宗封之为英显武烈王。宋元以前没有文昌帝君的称号。宋元道士造作神仙时，才有梓潼帝君主管文昌府和人间禄位的说法。元代加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这以后，人和星宿结合的道教神信仰逐渐发展起来。

1. 关于忠孝问题的神学解决

我们知道，道教发展在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神仙被造作出来，这并不是偶然的，把文昌和梓潼帝君结合起来，这是

一个令人费解又很有趣的事情。郭祝崧先生在《文昌帝君何许人也》中认为，张亚子原是雷神、战将、毒蛇、叛逆，以此作神名，令人费解。原因为何？文中没有说明，其他文章也未对此作出解释。^[5]

我们试图对其中原因作一番探讨：第一，任何文化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神仙的造出也是如此，他是人们造出来的。文昌帝君的出现，说明他有出现的背景和条件。为什么是梓潼帝君而不是别的神？从帝君的生平来看，他为母报仇，为国献身，这种忠孝兼顾的行为是很合统治者的心意的。《巴蜀道教碑文集》“修建文昌祠碑记”记载，“梓潼报母之仇则孝，仕而战没则忠。忠孝彰彰，在人耳目，横天塞地，万载不磨。天下后世，晓然知有忠孝，不至晦盲韬蔽，皆有以倡明之”^[6]^(P343)。这段碑文是泸州人林中麟在任上完成的。忠孝是统治者教化天下百姓的手段，宋代形成的道教净明道一宗就提倡“忠孝立本”，并提出忠孝神仙的典范。这和统治者的意愿是相符的，因而得到统治者的册封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忠孝行为在梓潼帝君身上展现，并且由他主管文人命运和禄位，这也符合统治者的意愿。文昌帝君的职责和功能是“司禄”和“辅元”，唐宋以后文人进入仕途的手段是科举制，让具有忠孝行为的文昌帝君来管理文人，使得文人在进入仕途之前先进行忠孝思想教育，这样士人才会尽忠尽孝。道教对比儒家孝道文化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利用神佑鬼惩来进行约束。

首先，在对待文章智慧上，通过科举，榜上有名，并不仅仅是文才的问题，而是以是否行孝为标准。《孝子文印偈》中说：

至文本无文，韞之孝道中，发现自成章，司之岂容泄。天聋与地哑，非聋亦非哑，特将天地秘，不使尽人知。朱衣与魁光，变幻文人心。遇彼不孝子，塞其聪明路，遇彼纯孝子，闻其智慧途。凡才作仙品，仙品作凡才，文虽有高下，黜徙岂人操。或因前生报，或因今生报，今生或后报，必当为孝显，文章作证明，阐扬在大道。^[7]^(P307)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好的文才本来是没有的，它蕴藏在孝道中，一旦发现它就可以写出文章，中举登科。遇见不孝的人，就会塞决他的智慧，遇见孝顺的人，就会开启他的智慧。平庸的人也就变成智慧高的人，智慧高的人也会变成平庸的人，这些都是因为是否行孝的结果。即使文才有高下之分，但是由于因果报应，禄位也会有提升贬低的不同。

其次，在对待因果轮回上，《文昌帝君本传》中说：“文昌，先天之孔子；孔子，后天之文昌。不必以孔子不言轮回，与帝君所述一十七世者异而存分别见也。”^[7]^(P299)文昌和孔子是一体的，只不过先天和后天的形式不同，在天为神为文昌，在地为人为孔子。道教讲轮回是为了让士大夫知道因果报应，不致甘心堕落。《文昌帝君阴骘文》中讲：“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慈祥为国救民，忠主孝亲……”^[8]^(P402)。帝君告诉我们他自己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这都是因果报应的结果。

元统治者册封文昌帝君的原因就很明显了，孝亲只是

手段, 劝忠才是目的, 这又回到文章起初讨论的问题。道教文昌帝君的出现巧妙地解决了忠和孝不能兼顾所面临的矛盾。

2. 儒家孝道行为的矛盾和问题的化解

如果说总结儒家孝道文化的著作是《孝经》的话, 那么道教孝道文化在自己的发展中也不断产生出一系列反映孝道的著作。例如《文昌帝君劝孝文》、《文昌帝君劝孝歌》、《文帝孝经》、《文昌帝君阴鹭文》等等。这些著作针对儒家孝道文化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作出了回答和发展。对比《孝经》, 道教孝道文化的思想和发展有:

首先, 论证了孝道的权威性。

《文帝孝经 育子章第一》中, 文昌帝君说:

乾为大父, 坤为大母, 含弘覆载, 胞育万有, 群类咸遂, 各得其所, 赋形为物, 秉理为人, ……相安不觉, 失其真性。父兮母兮, 育我者宏, 两大生成, 一小天地, 世人不悟, 全不知孝, ……乾坤养物, 劳而不劳。父母生子, 不劳而劳……^{[7](P301)}

这段话把乾坤比成大父母, 养育万物, 功德宏大, 生育我的父母是小天地, 他们的功德也是宏大的, 父母生育子女, 劳苦一生, 与天地的功德是一样的, 世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不孝顺父母就像不顺天地一样。

其次, 提出了“至孝”的概念, 以及如何“辩孝”。

对于儒家孝道行为的虚伪性, 文昌帝君提出“至孝”, 《文帝孝经 辩孝章第三》中讲:

……亲存不养, 亲歿不葬, 亲祚不延, 无故溺女, 无故杀儿, 父母客亡, 骸骨不收, 为大不孝。养亲口体, 未足为孝。养亲心志, 方为至孝。生不为养, 歿虽尽孝, 未足为孝。生既能养, 歿亦尽孝, 方为至孝。……奉行诸善, 不孝吾亲, 终为小善。奉行诸善, 能孝我亲, 是为至善。孝之为道, 本乎自然, 无俟勉强, 不学而能, ……因心率爱, 因心率敬。于孝自全, 愚氓愚俗, 不雕不琢, 无乖无戾, 孝理自在……^{[7](P303 - 304)}

此段告诉我们: 至孝的含义是, 父母在世时, 应该赡养他们; 父母去世时, 应该埋葬他们。反对不赡养父母, 不埋葬父母, 以及杀儿溺女。在至孝中, 关键的一点是要“养亲心志”, 即赡养父母从自己的内心意志出发, 对父母给予真心的爱护和尊敬。并且认识到, 孝道是自然而然的, 不学而能。

在《文帝孝经 体亲章》中也有这样的认识, “凡为人子当以二亲体我心者还体亲心”^{[7](P302)}。父母养育我是真心的自然本性, 那么我们赡养父母也应该以这样的真心去对待他们。《纯孝阐微咒》里讲, “胸中认得真分晓, 孝上行来总是道”。因而至孝的本根在于, 是否具有孝敬父母的真心, 并不是由自己身体自残行为来表现孝道。

再次, 以道教特有的理论说明孝子“守身”的问题。

道教孝道文化中的“守身”, 和儒家《孝经》中“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是一致的。《文帝孝经 守身章第四》中讲到了“守身”:

遵规合矩, 如前所为, 矜骄不形, 淫佚不生, 嗜欲必节, 父母之前, 声不高厉, 气不粗暴, 神色温静, 举止持祥, 习久自然, 身有光明, 九灵三精, 保其吉庆, 三尸诸厌, 亦化为善。凡有希求, 悉称其愿。兢兢终身, 保此亲体, 无亏而归, 是谓守身。……同归于道, 身居不动, 肆应常普, 如是守身, 是为大孝。^{[7](P305)}

此段含义是守身是遵守规矩, 不骄傲自夸, 节制欲望, 在父母面前, 温和安静, 举止安祥, 久而久之, 身体发出灵光, 各种精灵保护以得到吉庆, 连三尸虫也变化为善的, 这才是真正的大孝。在这里, 道教孝文化继承了儒家的守身思想, 并有所发展。它运用道教神灵来给那些守身的孝子以保护, 并且认为人的全身布满神灵, 腑脏四肢皆有, 所以不能纵欲, 不能触动刑律, 否则非死即伤。要想守身, 就应该遵纪守法, 老老实实, 在家做一个孝子, 出外做一个顺民。这充分体现了统治者对民众的思想压制。

最后, 通过“神佑鬼惩”手段来监督和约束世人行为。

《文昌孝经 孝感章第六》借用文昌帝君之口说:

不孝之子, 百行莫赎, 至孝之家, 万劫可消。不孝之子, 天地不容, 雷霆怒殛, 魔煞祸侵; 孝子之门, 鬼神护之, 福祿畀之。^{[7](P306)}

对于孝与不孝的不同行为, 我们可以看出神灵对待他们的态度各异, 孝子受到天地鬼神的保护, 上天给予他们福祿, 并且孝道所到达的地方, 一切厄运都可避免。而不孝之子则天灾人祸, 天地不容。这是对世人是否行孝一个很有力的监督手段。

三、结语

中国的孝道文化在宋元时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儒家孝道文化越来越显现出它自身的矛盾和难题, 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文化的灌输和改造, 道教孝道文化在吸收儒家孝道思想基因和解决儒家孝道难题的基础上完善了。尤其是文昌帝君的出现, 从神学的立场解决了忠与孝的两难问题、如何辩孝的问题以及孝的言行一致等一系列问题, 从心理和行为上建立了神佑鬼惩的监督手段等, 表现出独特的宗教特色以及中国本土的文化特性, 为中国孝道文化的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 [1] 肖群忠. 孝与中国文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2] 晋文. 论经学与汉代忠孝观的整合[J]. 江海学刊, 2001, (5).
- [3] 鲁迅全集: 第 11 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4] 盖建民. 孝道与医道[C]. 2002 年中国道教净明道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2002.
- [5] 郭祝崧. 文昌帝君何许人也? ——中国“人造神”诸例之一[J]. 重庆师专学报, 2001, (2).
- [6] 黄枝生. 文昌帝君[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0.
- [7] 藏外道书: 第 4 册[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2.
- [8] 藏外道书: 第 12 册[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2.

[责任编辑 尚东涛]